

教育：“有价”“无价”的互构究竟是怎样的？

——“泽利泽视角”的触发

马维娜

【摘要】 在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建构中，经济类的有价与情感类的无价既不是非此即彼的事，也不是孰重孰轻的事，更不是轮廓鲜明的事情，它们彼此胶着、相互渗透、不断影响、深远转变。泽利泽视角对当代教育“有价”“无价”互构的研究触发本文聚焦于三点：孩子之于家庭，不仅饱含情感无价性，而且深蕴未来经济有用性，“母职经济人”可能充当“有价”“无价”的互构合成体；学生之于学校，不仅存有“今天我以学校为荣”的情感无价与现实有用，而且具备“明天学校以我为荣”的情感有价与经济有价，“效用选择”可能充当“有价”“无价”的互构合成体；培训之于知识，不仅把家庭对孩子情感无价的呵护无缝转接为对有用知识平台的倚赖，而且让知识借助市场获得价格的普遍认同，“货币象征”可能充当“有价”“无价”的互构合成体。

【关键词】 泽利泽视角；有价无价；胶着互构

“泽利泽视角”的关键要义是高度关注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尤其在市场或价格与人格或道德价值之间的交互关系，高度关注社会结构因素如阶层或家庭结构与价格和价值之间的交互作用，高度关注儿童的价格与其情感价值之间正在转变的相互作用模式。在此之前，大多数人对“市场和非市场的人格价值之间的”关系特质所秉持的假设是：价格和价值被看作完全是两类事物；经济考虑持续地、不可避免地被放大；价格转化价值的威力毫无疑问，反过来价值对价格的转化却很少被概念化^①。“泽利泽视角”对当代教育的研究触发是，在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建构中，经济类的有价（有用）与情感类的无价（无用），既不是非此即彼的事，也不是孰轻孰重的事，更不是轮廓鲜明的事情，它们彼此胶着、相互渗透、不断影响、深远转变。而在文化与社会意义中，货币是多重性的，儿童的生命是多重性的，有价无价（有用无用）也是多重性的。由此，教育“有价”“无价”之间的多重互构，可能成为探寻进入“深水区”中国教育改革深度复杂的另类解释路径。本文试图解释的问题分别是：第一，家庭“有价”“无价”的互构究竟是怎样的？孩子之于家庭，不仅饱含情感无价性，而且深蕴未来经济有用

马维娜，教育学博士，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南京210013）。

①参见[美]维维安娜·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王水雄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导言第16页、第一版译后记第310页。

性,“母职经济人”^①可能充当“有价”“无价”的互构合成体;第二,学校“有价”“无价”的互构究竟是怎样的?学生之于学校,不仅存有“今天我以学校为荣”的情感无价与现实有用,而且具备“明天学校以我为荣”的情感有价与经济有价,“效用选择”可能充当“有价”“无价”的互构合成体;第三,知识“有价”“无价”的互构究竟是怎样的?培训之于知识,不仅把家庭对孩子情感无价的呵护无缝转接为对有用知识平台的倚赖,而且让知识借助市场获得价格的普遍认同,“货币象征”可能充当“有价”“无价”的互构合成体。

一、“用”与“价”:充满互构的解释

实现对教育“有价”“无价”的互构关注,一个重要的前提性工作就是对上述关键要义涉及到的两个重要概念的把握:一是“用”,一是“价”。着重厘清的是对《给无价的孩子定价》里作为实体的“用”与“价”与作为关系的“用”与“价”,是如何内在交织与多重胶着,以及如何带来对教育有价无价的解释触发。

首先,“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句,并不是简单表明现在的孩子是无价格的,所以要给他们定一个合适的价格。而是作者的一种历史过程性阐释,是作者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60年跨度中,呈现儿童从有用无价到有用无价再回到有用有价的新神圣化思考的一种过程性阐释。其深刻意涵是,20世纪经济上无价的孩子的定价过程成为金钱的“商品化效应”与价值的“神圣化效应”相互作用的检验性案例,成为有用无用、有价无价、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复杂交错、相伴相生过程。因此,“过程性”是解读和把握“用”与“价”或“有价”与“无价”的首要前提。

其次,在尽可能走近原著解读“用”与“价”时,不断出现的是困惑、费解以及相对疏朗的不同体验。一是“用”更多与有无“价格”相关,是否“有用”似乎可以用能够衡量的“价格”来表明,即“有用”更多指有价格,“无用”更多指无价格。而“价”的情况则有点复杂,起码有两种理解:一方面,“价”可以用来指“价值”,此时,是否“有价”更多指的是是否有价值,“无价”更多指的是无法用确切价格来作衡量的价值;另一方面,“价”又可以用来指“价格”,此时,是否“有价”更多是是否“有价格”或是否“有用”的简略表达,而“无价”则是没有价格或“无用”的简略表达。两种不同的意涵需要借助上下文语境进行相应的理解,无疑也就带来解读的难度。二是若防止出现理解上的歧义和无法说清的意涵语境纠缠,假如尝试一种简便的使用,即把能够用价格进行衡量的视之为“用”,而无法以价格衡量的视之为“价”即价值,这样,说“有用无用”指的就是有无价格,说“有价无价”指的就是有无价值。然而,这种简便的危险就是可能隐匿事物的复杂性,无法准确且多元地理解所要表达的实际意义,更无法呈现“用”与“价”的相互缠绕与因境而异。三是关键在于“用”与“价”事实上就是相互缠绕、因境而异的。说“无用”时,一种情形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无价”的同时存在,这里的“价”更多是可以计量的价格,此时“无用”与“无价”可以互换;另一种情形,说“无用”时虽然很大程度上表明事实上的“无用”如儿童意外死亡,但其有价性却仍然存在或由此生成,且正因为有其有价就会带来人们经济情感观的改变,此时就不是无用无价而是变成“无用有价”。而说“有用”时,一般与有价格相关联,一旦有“价”,那种作为无可估量的无价性似乎就不在此列;说有用就有价,多半是从实体的“用”与“价”意义上使用的。四是在过程与关系把握中对“用”与“价”进行解释。“经济上无用”“情感上无价”的儿童的社会建构过程也是价格与价值的独立性与相依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价”与“有用”相关联时,“价”更多可以用价格来计量和换算;“有价”与“无用”相关联时,“价”可能更多具

^①参见杨可:《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3期。

备价格与价值两种意涵。“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的过程也是对可能包含儿童工具价值的情感价值的一种新的评价过程。这个评价过程包括：如何既使儿童很好地成为一个协作家庭单元的“无价”而“有用”的参与者，又使儿童的神圣化和带回到社会性与经济性生产角色之中的儿童世界超越私人家庭和私人奢侈品的边界，随变动的家庭结构和新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而被重新界定^①。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无价”更多与“无用”相关，“无价”表明没有价格，没有价格也就失去其有用性成为“无用”；另一种“无价”更多与无法估量的“价值”相关，无论有用还是无用，都不是简单的价格所能简单计量和换算。也许，“用”与“价”之间或实体或关系的纷繁交错，正体现出“互构”所要表达的既矛盾重重、边界模糊，又内在影响、深层转变的历史过程。既然“价”的多重意涵中包括了“用”（有用或无用）的意涵，所以本文以“有价”“无价”作为标题，且“价”因境理解也就基本吻应原著的标题意涵表达。

再次，“泽利泽视角”关注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中“用”与“价”的交互建构，对教育日常生活中“用”与“价”的理解具有触发意义，因为事实上教育生活无法与经济生活根本脱钩，或者说教育生活始终与经济生活如影随形甚至包孕其中，教育生活中的“用”与“价”的“互构”与经济生活中“用”与“价”的“互构”存在相当的相似性。如此，才有开篇所言以及下文具体分析的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母职经济人”可能充当孩子之于家庭“有价”“无价”的互构合成体；“效用选择”可能充当学生之于学校“有价”“无价”的互构合成体；“货币象征”可能充当培训之于知识“有价”“无价”的互构合成体。

二、孩子之于家庭：“母职经济人”式的互构合成体

在经济学家劳伦斯·奥尔森（Lawrence Olson）的《孩子的成本》（Costs of Children）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达：“这么多的年轻夫妇仍然决定拥有小孩，证明他们企盼从他们的后裔中获取金钱之外的好处。”一个全美性的有关生养孩子的心理动机调查，证明孩子的价值主要是在情感方面。在被问到“拥有孩子的优势和好处”时，最为通常的回答是对爱和情感的渴望以及成为一个家的感觉^②。这表明，与18世纪美国家庭的有用价值观相比，孩子的“有用”已经退居后台或者说孩子不再首先需要是“有用的”，而更多被认为是“无用”或暂时无用的。“无用”表明的是无价（格）的，“暂时无用”表明的是将来或许“有用”且或许“无价”（无可估量的价格与价值）。当今中国若以同样的问题发问，类似的回答固然可能同样存在，但引发的进一步且无法回避的话题恐怕更多不是对“拥有孩子的优势和好处”的具体细化，而是拥有孩子无比艰辛的描述以及不想拥有孩子的众多理由，其中教育成本太高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而这里的教育成本太高不仅是一个教育经费经济成本的考量，而且是一个多重因素相互交错的考量，经济、社会、文化、心理、情感诸多要素通过家庭中的孩子聚集、牵扯、搅拌在一起。这种情形下，家庭角色之间会发生怎样的转化？孩子在家庭中“有价”“无价”的互构究竟又是怎样的呢？在过程性与关系式梳理中可以大致区分为三个主要时段：

第一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即从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前夕。孩子在家庭中的“用”与“价”，既与社会、时代赋予家庭的位置关系紧密相关，也与家庭赋予孩子的不同期许实时勾连。计划经济时代，家庭与单位、国家结成紧密型依赖关系，作为家庭的孩子更多也是单位的孩子、国家的孩子，家庭、单位、国家之间形成一个生存、生活、生长的系统链。在整个从单位托儿所到单位子弟学校再到单位孩子接班就业的长过程中，家庭是心安且心定的，家庭中的个人包括孩子虽说没有太多优质资源享用，

^①这部分依次参见[美]维维安娜·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第230—231页、导言第19页、第246—247页、第240页、第235页、第246页。

^②参见[美]维维安娜·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导言第2页。

但也基本没有什么风险。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因为单位的顶替政策和国家的包分配政策,起码为这些家庭上了一份基本保险。不可否认的是,家庭与家庭之间因为所处单位不同,孩子与孩子之间因为先天禀赋与后天发展不同,会出现一些相应差异,也会出现一些相互攀比与相对不公平,但那个时代整体资源的匮乏,各类资本积累的不丰厚,以及可提供机遇与可选择机会的同样匮乏与不丰厚,相互之间的竞争相对较为平和。在那样的时代、社会、家庭境脉中,“用”与“价”之间形成的大体格局是:一类主要是农村和贫困地区家庭的孩子,大多数与《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描述的19世纪的情形有所相似,即从一出生就变成未来家庭劳动力和经济收入来源的一个“有用”者,并且尤其是男孩同时变成家庭中老有所依的“有用”者^①;另一类主要是城市劳动者和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大多数则与《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描述的19世纪的情形有所不同,家庭起码并不立即指望他们的孩子从一出生就变成未来家庭劳动力和经济收入来源的一个“有用”者,更不是只有男孩会成为家庭中老有所依的“有用”者。而是在没有太多高等教育资源享用下,“顺其自然”会成为这类家庭“用”与“价”的基本接受模式,继而形成子承父业式的实际格局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安贫乐道。

第二时段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和市场经济转型,一方面是资源的源源不断涌入和机遇机会的提供重组,另一方面则是大锅饭端走、包分配打破,高考制度改革更让每个家庭、每个人对现实和未来都真切面对各种不同的选择、竞争、担忧与不确定,孩子在家庭中的“用”与“价”也在发生悄然的变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时代的家庭开始意识到,相比于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一出生就具备其经济有用性和情感有用性来说,此时可以直接升入高等学校的机会选择相对拉长了孩子在家庭中经济无用性的时段,而这种拉长的同时,也在为家庭的未来经济做着“有用”且“有价”的储备。至于情感的有价无价,虽与计划经济时代有所不同但并没有断然裂变。也就是说,并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家庭的孩子在经济上具备有用性的同时情感也就相应无价,市场经济时代家庭的孩子开始在经济上从有用转向无用时情感也会立即从有价转为无价,只是前者的劳动力生产的经济有用性似乎更为直接,其情感的老有所依的有价性似乎更加平和,而后者在高等教育资源享用、未来市场就业人才竞争、社会身份地位流动性增强、生存境遇不确定性加大的多方钳制下,开始出现焦虑甚至焦躁,家庭中的孩子在家庭未来诸多有用与有价的期待中也开始发生变化。

一种变化是“好学生”的无价胜过“好孩子”的无价。即便在家庭,虽然听话、懂事、孝敬的好孩子形象始终是家庭对孩子的重要角色期待,然一旦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亲子关系受到上述多方因素钳制,一般意义上常态的好孩子、好父母角色就开始显得有些局促与单一,社会、学校、未来多种角色丛的期待掺入,使得即便在家庭,对孩子“好学生”的心理满足开始胜过对“好孩子”的心理满足。也就是说,家庭中父母与孩子之间给对方都带来的情感情绪体验会因为来自学校的夸赞与表扬而增强其情感情绪体验的快乐度与满足感,随之增强的更多期待不仅是精神的、情感的、心理的,更有以经济报酬形式来体现家庭对好学生认可的无价情感的有价表达方式。渐渐地,情感无价性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轻易显现和察觉,而有价的情感则更多会在孩子成绩波动起伏的急躁与不安中挺身而出。此时,好孩子的标识更多是好学生的标识,而好学生的标识更多是好成绩的标识,且是持续好成绩的标识。家庭的无价陪伴与交流成为实际的对有用成绩、有用排名的小心翼翼的询问甚至质问,并使这种有用的成绩、排名与经济奖赏形成事实上的波动起伏,无价的未成年人的呵护温暖也形成事实上的波动起伏,家庭中的“用”与“价”重现出类似“劳动力有用性”的窄化。

另一种变化是以“未来有用”替代“现时无价”。“走出去”的经济未来有用期待一定程度上异化

^① “孩子的出生被视作未来劳动力的到来以及父母晚年生活的保障而被欢庆”。参见[美]维维安娜·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导言第3页。

了家庭中孩子的“用”与“价”。资源增加与机会增多使家庭期待孩子出人头地的经济未来有用性也随之增强。处于社会底端的家庭,父辈们对自身知识荒芜的痛楚以及难以走出去的无奈,导致非常期待在资源和机会增多的过程中,通过“替代式”的学习投资从孩子身上挽回自己丧失的教育机会,或者说把孩子的现时无用与未来有用更多关联起来。此时,家庭中独特的“情感无价”退居到“现时有用”的学习身后,父母对孩子的情感也在这种有用学习的过度关注中强化了其有用性。与此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国家独生子女政策,逐渐形成4:1或6:1的情感集中投注的家庭关爱宣泄模式,在家庭中建立起一种灌注了“有用”因子的、非同寻常的儿童神圣性。无休止的照顾,过分而多余的关心,过早悬置起孩子本真自然的天性,又过早把孩子整天禁锢在书桌和书本里。神圣的情感无价与禁锢的书本有用,在未来输不起“用”与“价”的独生子女身上开始有效结合起来。

第三时段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竞争进一步加剧,教育市场化和公共教育私事化使国家与家庭的关系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孩子在家庭的现时无用与未来无价且有用使家庭的经济、情感、呵护、规划、责任、设计等越发复杂起来。“母职经济人”的诞生,恰好把“价”与“用”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扭结、相互建构的紧密与微妙凝结成一个具有时代特质的典型形象。这里,“经济人”起码表明其行为与投入、产出,设计、安排,权衡、运作等市场要义相关,而“母职经济人”表明的则是作为经济人的特殊性所在。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母亲(更多不是职场意义上的母职)的“用”与“价”主要是生育、养育,呵护照料并顺应孩子的自然成长;市场经济初期,虽然不同家庭资本、不同家庭阶层开始无法袖手旁观于孩子的教育,但毕竟孩子在家庭中的“用”与“价”尚未进入准市场运作模式,那么,母亲一旦成为母职且成为“母职经济人”,孩子、家长、家庭、学校、市场的“用”与“价”就越发纠结、胶着在一起。孩子在家庭中的“现时无用与无价”更多指的是孩子作为儿童在家庭的一种存在样态,“母职经济人”的出现则开始提前预支孩子的未来有用与有价,起码把有用与有价更牢固地现时捆绑在一起。孩子被家长按照各种需要、不同节点、多样选择,程序化进入名目繁多的培训点时,更多则是作为“未来肯定有用与有价”的准成人的存在。只是这种预演式的规划、安排、运作,作为“母职经济人”的母亲更为自主而不乏强势,更为急迫又略显焦灼。“母职经济人”一方面成为一个相当艰辛且高能量的角色,另一方面让孩子过早进入并体味类似人生职场的方方面面,是否也是对未来稀缺资源获取而提前投入的另一种“有价”成本?

三、学生之于学校:“效用选择”式互构合成体

经济学上“效用最大化”理论,表明的是当消费者最为满足的时候效用达到最大。消费者对若干消费品的选择,在达到每一种消费品的单位货币支付所得的边际效用相等时,实现最大总效用,即称之为效用最大化原则。理论而言,“效用最大化”似乎与学生和学校关联并不十分紧密,毕竟学校不是纯消费场,学生也不是纯消费品。在学校的所有公共话语中,学生作为教育改革的起点和终点,总是毫无疑问地被摆在最醒目的位置,如此,全体学生都是“无价”的,全体学生也都是将来“有用且有价”的。但作为学校,事实上存在的内在矛盾与纠结是:既如何表明在诸多内外压力下学校仍然秉持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本真,又如何求得在纷繁复杂的生存处境中学校的最佳发展?既如何突显持续关注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又如何快速有效地呈现学校的教育成效?因为“正规的学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来组织和控制的。这就意味着一个完整的学校教育过程在本质上——怎样付费、寻求达到什么目标、如何测量这些目标、谁有权控制、什么教科书被通过、谁做得好和谁做得不好、谁有权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等等——是政治性的。因而,作为政治机构的一个有机部分,教育系统经常处于这些重要斗争的中心,即为民主而斗争、为合法的权威和文化而斗争、为谁应当从政府和实践中获益最大而斗

争”。^①这样,学生对于学校的“用”与“价”,在相当纠结更无法简单得出结论时,“效用选择”就演译为在不同时段、不同情境下较好地应对与协调多方不易生存的有效选择,且起码具备两种典型的日常表达形式。

其一,“效用选择”的结局性学校表达。这里的关键是学生与学校之间时长与时效的“用”与“价”的博弈。在基础教育的不同学段,学生的最短时长也有三年,最长则六年。遵循基本的学生成长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学生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有一个相对缓慢、波澜不惊又悄然变化的量的积累过程,其数量的众多更为缓慢渐进的时长增加了观察所有学生成长变化的难度。全国两亿多中小學生即便分摊到各个学校,一般情况下一所学校也会少则几百人、几千人,多则上万人,在这样的短时长、大数量里要达成学校发展的最大效用支撑,学校不能没有自己的设想与谋划,其中可能的选择就是学生之“用”与学校之“用”的选择。换句话说,在这个一切都讲究“快”的时代,一种“金字塔”式的关注法,即以学校最优秀的一类学生的关注来代表或取代处于“橄榄型”中部的绝大多数学生的关注,至少可以达成这样的最经济和最有效:迅速传播学校声誉,实时获取外界资源,快速谋求发展动力。这样,在学校的成果汇报、应对检查和发展评估时,以诸如清华和北大录取率、国际国内获奖率来涵括全体学生的全面素质提高,既愈发突显其少数甚至极少数学生的“有价”和“有用”,也实现了学生与学校之间时长与时效的转换:一种是以学生代表者的“有用”与“有价”放大至全体学生的“有用”与“有价”,并实现学校绩效的最大化;另一种是把学生暂时无法显现的或隐匿的、生命的、成长的、人性的、发展的等因子,在一些特定的节点如现场检查、督查、参观、考察等时段,悄然兑换成可以计算量化的、可以选择兑换的经济因子,让学生与学校、学校与声誉、教育与发展、教育与经济之间在此时构成一种相对简单但肯定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转换或许并非是学校对全体学生的有意忽略,但却习以为常成了实际的学校对外话语展现模板;或许也不必一味指责学校的功利甚至势利,但却更要思考的是经济要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可量化的经济要素,怎么就成为教育过程中考量日趋活跃的元素?学校什么时候会把时长与时效整合看待,什么时候又会把两者区分开来计算?抑或教育本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神圣?在世俗的经济与纯粹的神圣之间到底需要一种怎样的张力?早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贡献的一个关于发展的独特视角就是以自由看待发展。即在以能力这一概念为核心的自由观之下,将发展的不同侧面——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之中。当发展的目标被确定为对人的自由的扩展的时候,就不可能只关注经济增长,而必须同时关注社会和政治的进步。^②

其二,“效用选择”的过程性学生表达。这里的关键是学生、学校、行政、高校多方关系中现时与未来之间时长与时效的“用”与“价”的博弈,且呈现随行就市、水涨船高的过程性特质。一位学生写给钱理群的信把这种“用”与“价”的权衡表达得相当理性:“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③“现时有用”与“现时有价”在高考专业选择上尤为突出。据了解,2015年浙江全省选考物理的学生约36%,2016年近30%,2017年则更低,有断崖式下降趋势。对浙江省1598名首批选考学生的问卷调查则发现,由于影响因素众多,选考中呈现多种复杂现象,如偏理偏文现象、学霸科目现象、“马太效应”现象、避趋冲突现象以及自主无助现象。江苏在对某市从2003年高考改革以来的选科情况分析中发现其总的选科趋势是:考生越来越倾向于避开难度大、考生群体相对优秀的科目组。从整个选科过程及其相关研究看,一味趋利避害的选择弊端似乎一目了然,但各方又似乎都身处难处,即被

①[美]阿普尔(Michael W.Apple):《国家与知识政治》,黄忠敬、刘世清、王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②姚洋:《自由可以这样来追求——阿玛蒂亚·森新著〈作为自由的发展〉评介》,《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0期。

③曾鸣:《钱理群“告别教育”》,《南方周末》2012年9月13日。

挑选方的学生处于弱势,几乎没有话语权;挑选方的高校肩负高考选拔的主体责任,几乎不行使权力;监控方的行政占据最强话语权,几乎不敢越雷池半步。^①

这样的选择过程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只能如此”的过程,但究其实,选科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有价”“无价”的互构过程。在为自己、为家庭、为学校、为就业、为未来如何“定价”中,选科就并非完全是一个“只能如此”的过程,其中充满了矛盾纠结却内在涌动的博弈与互构。就被挑选方的学生而言,有一个选择与退让、兴趣与发展、当下与未来、情感与生命的多重博弈与定价的过程。“避开优选组合”是最大化自己有用性的有效行为,这种“现时”的有价与有用更多具备“实用”的成份,至于日后可能带来什么,此时不会考虑太多,悬置本身表明的是学生对成人成才、情感生命、未来发展的考量在相应定价面前的暂时隐退,尤其对于成绩中下层级但不一定都是中下阶层家庭的学生更是如此。选择行为本身成为一种真实的人生定价,两者交织一起似乎无法判断谁的“价”“用”更高,“貌似投机取巧”的行为也似乎无法否认其中的合理因素。这样的应对变换,倒在一定程度上使现时的眼前定价生出一份积极的意味,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着教育决策与政策变更的更加科学合理,一种弱者对强者的影响在“价”与“用”的权衡中彰显出来。

就挑选方的高校而言,作为挑选方他们会针对高考选科作一些相应的专业规定与调整,但真正能够静下心来进行相关专业需求研究以及现选专业如何与未来专业相互衔接和发展的,恐怕委实不多。这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当与未来专业的衔接一时无法看清时,高校与学生秉持了同样的选择理念,即当下的、眼前的需要成为考虑选择即“定价”的首选要素,此时物质性的、任务性的、指标性的因素可能会遮蔽学生当下选择是否合理,加之高校宣传与学生实际了解之间存在的空白地带,双方都把“现时有用”作为第一选择。二是在未来发展的更“虚”的现实面前,高校想的是学生实际进校后起码还有四年发展期,到时谈发展也为时不晚。高校的当务之急是完成相应招生任务,保住相应经费拨配,不致现行发展受阻。大多数学生因为根本就不了解可能选择的专业,也无暇了解可能选择的专业,先进门再说的即时选择成全了高校招生计划的完成。进门就是有用,长远的持续的定价或用与价的良性转换,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面前不得不暂时退下阵来。选择方与挑选方之间没有出现谁逼迫谁的问题,共同的“现时有用”使双方达成实际的共识,至于日后的“无价”都在等着后续再说。

就监控方的教育行政而言,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如果说不是从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科学选拔各类人才和维护社会公平出发,未免有主观武断之嫌。但这样一种理论上可以避免“现时有用”的过度功利选择的政策设计,却为什么演变成或偏科或避科或趋科的“有用型”博弈呢?选科数量与分布是监控方调控选科的重要依据,因为据此可以对整个选科情况进行评判、估价与调适。一般来说,只要总体上不出现大起大落就基本达成监控方选科政策制定的目标。至于选科是否与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未来发展相关联,监控方一般不会去做这样的定价,因为选科责任“给了”高校,发展责任“给了”学生自己。既然监控方不会去对选科的更合理有用或更合情有价进行定价,也就可能由此避开了为学生发展以及未来发展的实质性定价的职责,并可能成为学校“效用选择”的间接成全者。然而,政策制定或调整的深层目的决不只是选科本身,而是有一个选科的现实有用、情感无价以及未来有用与有价的“用”与“价”的多层面问题。政策的调控不应是去历史的或弱历史的,历史依据当始终是政策调控的过程性依据;政策的调控同样也不应是选科数字统计的简单效用调控,多因素调控考量中多方群体、多方层级、多方意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与复杂,当是政策完善的过程性依据。否则,多种组合

^①这一部分分别参见杨燕燕、余文一:《改“静”为“动”:新高考赋分办法修正对策——基于浙江省物理选考现状的思考》,《教育发展研究》2017年第22期;张雨强、顾慧、张中宁:《普通高中高考选考科目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5所高中首批选考学生为例》,《教育学报》2018年第4期;张天若:《从江苏省Y市高考选科情况看江苏高考方案——兼论浙江、上海的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年第3期。

的“有用且有价”的选择政策只可能窄化为几种有限组合的“效用选择”。

四、培训之于知识：“货币象征”式互构合成体

知识——更确切地说与应试紧密相关的知识，跟培训机构之间发生如此难舍难分的勾连关系，大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更多的培训机构则形成于本世纪初。本来，当知识（广义的）更多作为一种客观的、外在的事物加以接受时，其理性的成份相对居多。一旦知识加入学习者的实践探究、历史还原式参与，知识的学习就充盈出情感的色彩，知识的有用与情感的有价的结合使知识学习过程具备一种有用与无价的从容。遗憾的是，知识的学习受制因素太多，当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越发强烈，而优质教育资源本身又始终稀缺时，为知识定价的市场就会应运而生。这样，出现的一种深刻对立就是：一方面，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知识无用无价且反动的特殊历史时期后，知识仍然成为某种“力量”与“用”、与“价”继续保持着天然的关联，并持守“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的秉性；另一方面，知识的世俗性、实用性特质愈益突显，知识的有用性关注远远超出知识的无价性至少是未来无价性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窄化为与应试更为紧密的知识，于是，“待他们如现金商品的社会安排”^①开始运作也就成为一种不足为奇。更要紧的是，在这种不足为奇之中，借助于“货币象征”的“用”与“价”的转化与互构开始发生。

作为家庭的孩子尤其作为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无论他们的社会阶级如何，都被定义为是情感上无价的资产”^②，而这份情感上的无价资产借助于未来的成功就可能成为家庭的有价与有用资产。这意味着，当下学习的成败有可能是未来事业成败的重要依据，而当下学习的成败与否，不仅可能被看作是一个家庭的失败，而且还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家族可能的未来集体失败。换句话说，家庭中孩子的学习成绩可能导致孩子在家庭中的“情感无价”被知识学习的“现时有用”所抵消。培训机构的悄然崛起，恰恰把家庭对孩子情感无价性的关注无缝转接到对有用知识平台的倚赖。

这次离奇的“周六沉默”并没有持续多久。

“我憋不住，而且我知道这也没用。”王源说，那一天在课堂上，他偶然回头看到了妈妈忧虑的眼神，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

“我当时对他说，不上这个班，影响的是你将来一辈子。”李玫虽然嘴上危言耸听，可心里明白逼孩子上课实属无奈——“没有孩子会喜欢做题的，但是没办法，就是为了能让他考个好学校。”^③

追究起来，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一直致力于要解决的起码有两大问题：一是“减负”，一是“择校”。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发出新中国的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其后60多年里，“减负”被国家教育部门喊了数次，各地的“减负令”更是多得无以计数，但结果却是学生的课业负担越减越沉重。而检视2014—2018年最近五年国家有关“就近入学”的政策规定则发现，除了2018年，其他每年教育部都是以1号文件的形式下发的，且“就近入学”的语气逐年加重。至于规范教育教学行为的政策更是规范、严格加严厉。如某省教育部门在2009年发布的被称为教育新政的“五严”规定（即严格禁止下达高（中）考升学指标、严格控制学生在校集中集中教学活动时间、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严格规范考试和招生管理、严格制止义务教育办学中的违法行为）不可谓不严，且进行了覆盖全省的随机督查。所有这些似乎都无可厚非、无可挑剔，问题的关键是从来就不是教育一

① [美] 维维安娜·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第218页。

② [美] 维维安娜·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第33页。

③ 卫佳铭：《爱恨培优班》，《南方周末》2016年12月1日。

家之事的“教育问题”同样不可能期冀教育一家所能解决,在暂时还无法完全到位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教育改革面前,规范教育教学行为的政策在管住了教育内部之事的同时,也把矛盾不动声色地或无辜地转嫁给社会并催生出名目繁多的培训机构。培训机构的诞生让(狭义的或应试的)知识借助于市场进一步获得一种价格的普遍认同,货币在履行其等价交换的基本功能时,借助知识也获得一种价值的普遍认可。“就近入学”演变成需要借助培训机构“加码”而入学的一种“价”与“用”的重组与粘连,关系的条子让位于培训费用的货币等价物。

于是,规范教育之外的培训机构又引发政府的治理关注。规范整治校外培训机构的政策同样可谓不严,但却从另一方面带来培训机构经济运行走势的另一种改变,即在那些不合规范的培训机构得到规范整治并予以取缔的同时,那些暂时合规范的培训机构却在规范整治中获得自身价格大幅上涨的空间,且是合法化的上涨空间。现时的有用培训与窄化了的有用知识相互结合,形塑出培训的“有价”与“天价”,看似非经济行为的政策发布与随行就市的经济行为之间立即达成相互呼应,知识的价值被隐匿到未来的有价与无价之中。规范培训机构的政策在管住了一部分培训机构的同时,又把矛盾不动声色地、无辜地转嫁给了家庭和家長。在一种文化的、神圣的教育或知识学习与未来经济价值的转变与缠绕过程中,培训机构的“有用”与“有价”都收获到了,知识终究还是为市场所俘获。市场呈现出的巨大的货币需求,既中和了孩子的兴趣与情感,又中和了家庭的无奈与无助,培训机构完成并巩固了自身“第一桶金”的采掘。固然,培训机构会在国家政策收紧、督查更为严格的规范中,更加突显其(广义)知识的素质功能,但究其实(狭义)知识仍然大行其道。如此,知识的有价与无价被放入一种实用主义的框架与现实之中,知识,更确切地说是“应试知识”演绎成为更大规模的商业化与货币化的过程。

在上述过程中,货币通过其象征意义完成了市场与价值之间的相互建构。在获取有用知识而进行的货币支付中,货币固然充当了知识获取等价物的功能,但在支付过程中,家庭对孩子的情感支付、期待支付成为市场定价洪流的保护堤,使货币具备了情感凝结和未来发展的象征意义。虽然作为交换媒介,货币可以为一切东西定价,但是当货币遭遇特定领域,譬如赋予了知识的升学、就业、未来这些超商业领域时,货币的象征意义和其量化功能反倒彰显出培训的“神圣性”来。神圣性的彰显又使得家庭、家长对近乎疯狂且高价的知识培训渗入几份理解与包容,并进而从经济价值上获得一种社会的、道德的、情感的信任指数。培训费用的高低与培训效用的高低无形中镶嵌一起,如同“神圣儿童领养的支付很少被以一种普通生意的方式来操作”^①一样,又无形中把庞大的市场与庞大的人群联结起来。“好未来2015财年的营收中,由‘家长帮’服务在线流量转化而来的线下学生将占到36%。”“家长帮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家长社区。截至2016年9月,注册用户超过1400万人,单日最高流量突破4100万人。”^②对培训机构的信任,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当下孩子的信任;对当下孩子的信任,也就是对孩子未来的信任。知识在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关联与胶着中实现有价无价的互构,且这种互构并不鲜明对立也不激烈冲突,以致人们甚至往往忽视,经济交往中的很多东西也还有某些不能用货币来表达的方面。人们甚至太轻率地相信,占有它们的货币价值就是占有它们的准确的、毫无剩余的等价物。无疑,对我们时代的很成问题的特性——不安定和不满足——而言,一个很深刻的原因就在于此。^③

(责任编辑:程天君)

① [美] 维维安娜·泽利泽:《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第230页。

② 罗欢欢、张安彤:《“学而思”里的教育史》,《南方周末》2016年12月1日。

③ [德] 齐美尔(G. Simmel):《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4—75页。

How Do the Elements “with Price” and “without Price” Configure Each Other in Education?: An Analysis Triggered by “the Zelizer Perspective”

MA Weina

Abstract: In the mutual configuration between economic factors and non-economic factors, being valuable in economic terms and being priceless in emotional terms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one does not take priority over the other, nor is one clearly separated from the other. That is to say, the two notions are closely tied to each other, penetrate into each other, continuously influence each other, and present profound changes. The research of “the Zelizer Perspective” on the mutual configura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whose value can be measured by price (i.e. factors “with price”) and those whose value cannot be measured by price (i.e. factors “without price”)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enables the present paper to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issues. To families, children not only present priceless emotional attachment, but also imply future economic value: it is the “economic person in the form of motherhood” that makes possible the mutual configura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To schools, students are not only emotionally “priceless” and of some practical value, as captured by the saying “Today we feel proud of our school”, but also have emotional and economic values which can be measured by “prices” in future, as captured by the saying “Tomorrow the school will be proud of me”: here, “utility-based choices” can serve as the basis for the mutual configura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factors. When it come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the care provided by the family that cannot be measured by “prices” is seamlessly transferred to the dependence on the tutoring platform believed to supply useful knowledge, where the market enables the knowledge to be measured by generally accepted prices: here, the monetary symbols can serve as the basis for the mutual configura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factors at issue.

Key words: the Zelizer Perspective; with price and without price; entangled mutual configuration

About the authors: MA Weina, PhD in Education, is Professorial Research Fellow at Jiangsu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Nanjing 210013).